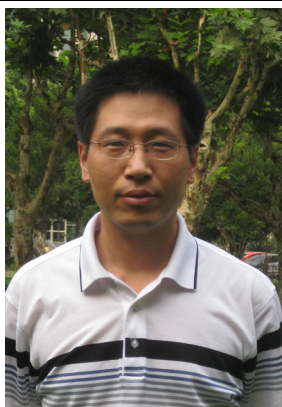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维解读

罗会德



【内容提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也是当前理论研究和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前提之一是要厘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复合概念,其基本含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实践论层面,就是从大众的实践出发并回到大众中去;价值论层面,就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方法论层面,就是通过大众的实际生活开展宣传教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以人为本 价值论 方法论

作者罗会德(1970-),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92)。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也是当前理论研究和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前提之一就是厘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对此,学者们立足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种种解释,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本文以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将来自人民群众实践的马克思主义重新交给人民群众,确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为大众服务的思想,并以大众的实际生活为基点来考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所有问题。因此,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一、实践论层面:从大众的实践出发并回到大众

从何处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起点问题。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和根本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集中表达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不仅是要能够科学地解释世界,还要能够合理和有效地改造世界,实际地改变事物和世界的现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正是这种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为此,马克思主义必须自觉地投身于实践和引领实践,并在实践中实现自身、检验自身和发展自身,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之基和活力之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投身实践和投身大众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基本方面。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 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与智慧、行动与实践, 是认识世界、批判世界和改造世界最为重要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 才能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因此, 投身实践就是走向大众, 引领实践就是掌握大众, 实现自身要依靠大众, 发展自身要提升大众。

由此可见,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取向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 也是实现实践性的必要途径。缺乏实践性的思想不可能有大众化的冲动和力量, 而离开了大众化, 实践性就失去了最为坚实的民众基础和主体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我们党提出的各项任务, 没有一项不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了解程度, 不仅关系到当前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 我们的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也只有当这种科学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理解和掌握, 并转化为投身改革建设的内在动力时, 我们的宏伟目标才能够顺利实现。

正确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 就是要求我们在理论宣传普及活动中要对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做出积极回应, 直面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 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设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和内容, 富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和教育, 而不能一味停留在“自说自话”的小天地里, 或者向群众传授那些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并且不能对实践产生实际指导作用的陈旧呆板的教条与规范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只有从更加广阔的领域出发, 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社会实践相结合, 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和信仰, 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坐标和实践的指南。也只有这样,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在理性的反思和重构中找到自己的生长点。当然, 从群众的实践出发和回到大众, 并不是简单消极地迎合大众, 而是要积极正确地引导大众。这样, 大众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起点, 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归宿点。“从大众的实践出发再回到大众中去”, 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二、价值论层面: “以人为本” 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是社会的主体。历史是人的历史, 是人们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历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②只有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现实性出发, 才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因此, 大众化也即是坚持“以人为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种高度人文性的事业, 是理论宣传教育的主体不断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过程, 它始终离不开一定的价值导向,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分析和论述都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一定的价值追求。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从根本上表明了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过程中所秉持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里, 我们可以把“以人为本”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以人为本” 强调关心人

关心人就是关心人的生活, 关心人的现实需要。需要是人对客观外在事物的渴求和欲望, 是人的生命存在、发展、延续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的需要不仅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质”^③, “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④人的需要是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 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第 10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第 51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第 130 页。

自身的规定性，是人的全部活动的原动力。“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①可见，关注人的生活以及人的需要的满足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时刻把人民的利益和疾苦放在首要位置。比如，在邓小平理论中，不仅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规定，而且还把“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构想，每一步都有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即“温饱型”、“小康型”和中等发达国家的比较富裕型。邓小平指出：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③可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在地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即从人们的需要和他们追求一定需要的对象化的利益着手，深入了解和理解人们思想——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及他们思想——行为演变的过程，然后正确地决定是强化还是转变他们现存思想和行为，正确地选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和方法。因此，了解和掌握大众的需要和他们的利益所在，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功的关键所在。

2. “以人为本”强调对人的尊重

尊重人，主要是尊重人之为主体的地位。人的主体性，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是人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主体所具有的本质特征，是人在处理外部关系时的能动表现，即人在认识和改造客观对象的过程与效果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和自为性。马克思扬弃了旧唯物主义关于主体——客体关系的机械反映论观点，把“实践”概念和辩证法引入认识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④根据这一思想，一种外部事物成为主体的对象性活动有意义的客体，不能单方面规定，即不能仅仅由于它是客观的存在，而同时要有主体同它的具体关系来规定。因此，应当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事物和感性，应当重视主体性因素，以及其与客体建立于实践基础上的价值关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是接受者对于宣传者和教育者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既包含着接受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客体进行的反映性认识，又包含着从其自身需要出发，依据自身的价值观念等的建构。大众接受活动既不是简单地承袭，也不是盲目地获取和否定，而是一个复杂的扬弃过程。“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播，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取得预期的效果，理应体现教育的这一核心功能，自觉地把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提升人的主体能力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不断地激发人的主体发展欲望。主体意识的培育当然不能以对待物或工具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不能像灌“香肠”那样，向群众灌输一些教条性的知识，而是应充分尊重接受者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发展特点，以主体的方式培育主体，在平等的主体性交互作用中，使群众的觉悟逐步得到提高。

3. “以人为本”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终指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8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1页。

③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4月5日。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页。

人的解放和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旨。马克思向往的未来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在1857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性为标尺,将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阶段。人的发展与三种历史形态相对应,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不断进行着,并且表现出越来越充分的自由与独立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解放。但阶级的解放并不等于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只是为人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因此,在这一步完成后,新社会就应该逐步由原来“政治革命—阶级解放”的主题,转换到“发展生产—人的解放”的主题上来。“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②因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③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④

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范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人的解放还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但是,作为一种价值目标追求,人的解放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上与共产主义相联系,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它既是一种规律真理的揭示,也是个人的目标追求。它基本能满足现实社会各阶层群众在观念层面上的要求。群众个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个体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体的精神寄托等等,都可以在人的解放的理论体系中找到相应的话语表达。因此,系统阐明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能够在人类情感的基础上与群众个体形成情感认同,从而形成巨大的吸引力。而个体群众也能够从人的解放的价值目标和价值意义上,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自由地选择实现自我的道路和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其实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人的解放的内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围绕着人的解放这个主题而展开的。从思想解放到身份解放;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贫穷到小康;从等待分配到自主择业、自由创业;从百姓意识到正在形成的公民意识等等,生动地显示了人的解放历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新的理论观点,进一步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新境界,实质上就是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主旨在现阶段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循着“以人为本——人的解放”这个方向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定能够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以人为本”的原则具体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对那种仅以工具化的眼光来看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强调以听话和服从为目的,“目中无人”的宣传教育模式的彻底摒弃,从而真正把入、人本身的发展和完善置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地位,更明确地把关心人、尊重人、发展人、开发人的潜能作为其宗旨,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闪耀着人文关怀,充满人情味,富于人性魅力的实践过程。

三、方法论层面:通过大众的实际生活开展宣传教育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主要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上,我们强调要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进行宣传教育。从实践开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自然不能绕开群众的实际生活和实际需要,也无法从群众的实际生活中走开。从生活中走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与个人真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

生活无关的活动,无法参与个人生活的充实与丰富,与个人生活相异质,理所当然地受到个体当下生活的拒斥。

通过群众的实际生活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以人们的现实生活经验为其基本依托。所谓生活经验,就是指人类生活历程在意识层面的凝聚。这种丰富而生动的实践经验往往是人们观察、思考问题的直接的感性依据。其中许多成分,或对于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佐证、注解的意义,或经过相应的引导,会升华为其所应具有的、教育活动所要在其身上实现的思想观念。因此,这种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紧密联系,往往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更迅速地被教育对象所接受打开便捷通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工人特别容易明白和领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因为这个纲领所说的,全是每一个有头脑的工人看见过、经历过的东西。”^①他强调:“要使鼓动工作对群众发生影响,就应该根据压迫的种种事实和表现来广泛开展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应自觉地把理论与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拉近理论与群众之间的距离。

事实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好政策使人民群众得到很大实惠,一些受惠的普通群众深深地折服于党的理论创新,这使我们看到了在民间蕴藏着宣传和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热情,也说明了通过人们生活经验来实现大众化是可行的。我们要善于利用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的切身感受,运用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生产生活的丰富经验,来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努力地把生活经验这幅多彩的图景展示在大众面前,使他们在较为完整和全面的生活经验中学习理论、提高认识水平,而不是把诸多的生活经验都排除在宣传教育过程之外,使原本十分丰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仅仅褪变为单调无味的、僵化的知识、空洞的教条的传递。

这里特别强调一下的是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个体生活经验的关注问题。脱离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往往是用客体化、学科化知识面貌呈现的类经验来否定个体经验的价值。从知识论的观点来看,个体经验是零碎的、不具有普遍性的,因而被排除在理论宣传教育的视线之外。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不能离开个体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每个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能是立足于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就类的经验而言,它也只有和个体的生活经验相融合,才能真正对个人的思想认识生成发生作用,我们常讲的“马克思主义入心入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舍弃个体经验,类的经验就不能进入个体经验的结构,不能与之融为一体。当然,重视个体经验,并不是把个体经验与类的经验截然对立,而是把这两者看成一个连续体。

通过群众的实际生活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向社会生活的深层渗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由于在本质上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理应更能以生活化和渗透性的工作方式实现其宣传教育的效果。具体来说,一是深入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机制。大众化的实现机制实际上是指理论体系或价值观如何吸引和说服社会大众的内在方式。一般来说,人们相信一些理论具有魅力,但征服群众的重要方式是从根本上反映、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即利益机制或民生机制。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解决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为突破口,不断探寻群众利益的反映机制、表达机制、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让群众切实感觉到我们的理论是为大众服务的理论,从而使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宣传教育与

① 《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6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7页。

能对人的思想发生教育影响的一切活动密切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当然的组成部分。二是发挥媒体文化的引导和教育功能。现在人们生活在一个媒体文化而不是意识形态直接起作用的年代,意识形态借助于媒体文化外衣的遮掩,进一步生活化、普遍化,以温柔的方式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一方面要主动适应信息时代的新要求,充分运用先进的数字网络载体,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立体互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体系,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大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理论宣传普及活动还要遵从文化发展的规律并通过自己的独特风格去赢得大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改变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以国家权力为支撑的单向“灌输”路径,顺应大众的审美趣味及接受方式,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建立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长效良性互动机制。只有如此,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文化才能顺利进入大众文化的场域,深深植根于大众文化的沃土,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大众话语”。在这点上,西方消费时代的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术思考是可资借鉴的。三是加强社会环境的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和文化系统工程,需要动员社会的广泛参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教学科研组织和群众团体应积极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习和宣传专栏,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进一步完善舆论环境。同时,还要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载体,比如,在学校,各门课程和各项活动都要贯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在社会,一切管理工作、闲暇活动都可以传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关信息。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教育场”的建设。“教育场”是指人们工作、学习、生活所处于的具有教育功能的环境。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环境之中的,通过努力营造好的氛围以及适合时代和人们身心特点的环境,可以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 [3] 欧阳康:《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与大众化取向》,载《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 [4] 文君主编:《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
- [5] 转引自邹进:《斯普朗格文化教育思想概览》,载《外国教育》1988年第3期。
- [6] 朱兆中:《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接受问题研究——兼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接受》,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 [7] 胡凯:《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根基》,载《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3期。

(编辑:张 桥)

ABSTRACT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Celebrations of National Day – A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Celebration of the New China's National Day

Chen Jinlong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the CPC and Chinese government hold a lot of activities to celebrate the National Day, such as holding celebrating conventions; organizing military parades and public demonstrations; publishing memorial articles or editorials; printing special editions; holding exhibitions and so on. These activities have a lot of social functions. First, with the celebration of the National Day, Chi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s national image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olitical image, economic image, military image, cultural image, social image and so on. In the meantime, government improves recognition by people. Second, during the celebration of National Day, Chinese government evaluates new china's development; sets development goals and chooses development paths. Therefore, political mobilizations are brought smoothly. Third, the government also sums up experiences of Chines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fter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s development. Last, during the celebration of National Da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prov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by stating diplomatic policies; inviting foreign guests and giving thanks to other parties or countries.

Review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PC's Anti-corruption and Advocating-cleannes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Li Binxiong & Huang Hong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PC's anti-corruption and advocating-cleanness has gone through a special proces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which includes the all-round exploration, devious development, the forming of institution, a new road and a theoretical system. The process can roughly be divided into six stage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surroundings, expecting targets, methods and result of construction of anti-corruption and advocating-cleanness.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course of history and important experience about CPC's construction of anti-corruption and advocating-cleannes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The purpose is to prob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to sum up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 to provide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corruption and advocating-cleanness which is focusing on the system of punishment and precautions against corruption.

Three-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Luo Huide

To carry out the propagandizing activities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e important tasks of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ideological propaganda.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remise is to try to clarify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Popularity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a content-rich compound concept, its basic meaning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levels: the ontological level, that is the practice of

• 159 •

starting from the public and return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value theory, which is the “people-oriented” value orientation; methodological level, which is to carry out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through the actual life of the general public.

Capital Logic and Financial Crisis

Lu Pinyue

Neoclassical economics fails to discover the essence of financial crisis because it explains economic phenomena without putting them in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claims that commercialized social labor produces not only wealth but also social relationship as the value in commodities which will transform and express as the market power. Property rights generate the market power construction which divides the surplus value to produce the market price system, and thus produce dynamics of economic expansion as well as the capital logic which takes the “dilemma of capital expansion” as its main content. This is the real reason of economic crisis in real economy. Fictitious economy system was generated in the course of securitization of assets, and thus the capital logic of real economy extends into fictitious economy, which makes the space for capital expansion maximally. The financial risks are transferred and accumulated continually and financial crisis outbreak finally.

Late Capitalism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Zhao Guangwu

Late capitalism is a new stage in monopolistic capitalism development, also can be named as international monopolistic capitalism, appears as monopolistic degree's great increasing accompanied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nopolistic stage, at the same time, national monopolistic becomes international. Its foundations are economic institutions, science technology, capitalism theory and financial tools. It has three possible measures to build up the monopolistic empire. Late capitalism has two essential features: international monopolistic capital and fictitious capital control the world's economy, financial oligarchs become dictators of the world's economy and politics. Financial Crisis 2008 demonstrates that international monopolistic capitalism in high degree of parasitism and corruption is already on the road of fall.

The O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the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Ye Weiping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the o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on infringing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sovereign rights as well as resulting in the economic crisi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 exact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proposes the damage on the economic sovereign rights, i.e. the making policy, the economy management, the formula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utilization, the important resource and strategic industry control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the o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t expound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the primary factors of the o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e. the dangerou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 the wrong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 the unjust international finance relation, on resulting in the economic crisi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proves especially the damage of the o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on the economic system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the four fields to remedy its deficiency.